会 员 通 讯

2015 年第 2 期

（总第 46 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　　2015 年 1 月 20 日

目　录

工作动态

曾培炎论述新常态下改革、开放和创新三者关系 ……（2）

曾培炎解读经济发展新常态六大表征 ……（5）

2014 年是转折之年 ……（8）

中国经济年会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9）

中美投资和贸易谈判（BITT）研究成果发布 ……（12）

第二届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在京召开 ……（14）

中韩经济合作论坛在京召开 ……（16）

第二届东亚环境治理与产业合作论坛在京召开 ……（17）

国经中心举办第 64、66 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18）

权威言论

曾培炎：在 2014~2015 中国经济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21）

张晓强：推进中美 BITT 谈判迈向更深层次的中美经贸合作 ……（27）

魏礼群：继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33）

郑新立：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 ……（39）

国际交流 ……（45）

[工作动态]

曾培炎论述新常态下改革、开放和创新三者关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2014－2015 中国经济年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改革、开放和创新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支撑，改革营造体制条件，开放拓展经验借鉴，创新提供实践基础，并就这三项关键任务的重点取向作出论述。

曾培炎说，不能否认，“新常态”阶段也是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的阶段，不少国家因为没有处理好而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在“新常态”下做好未来经济工作，必须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三项关键任务，发挥好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未来应该继续用好这个法宝。同时，根据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要求，还应与时俱进地把创新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改革为开放和创新营造体制条件，开放为改革和创新拓展经验借鉴，创新则能够为改革和开放提供实践基础。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支撑，是实现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目标的必然途径。

第一，改革激发新活力。改革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得到有效发挥。但是改革的任务还远未结束，在很多领域和方面，还存在阻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解决这些瓶颈和制约是改革攻坚期的重要任务。“新常态”下需要进一

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使各类经济主体和要素更充分地发挥积极性。政府职能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致力于建造公平透明的法治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能够为创新营造更好的体制条件、政策环境，激发创新活力。也只有不断改革、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才能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力争在2020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开放释放新推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现在，我国外贸总量已经很大，去年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外贸依存度开始回落，需要对未来的对外经济发展提出新的对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客观上要求我们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推动建立多双边贸易投资制度安排，扩大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维护我在国际上的正当权益。此外，世界经济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也需要我们主动把握机遇，实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再融入”。新一轮的开放，将有力推动扩大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发展空间，推动产业链和国际分工向高端迈进。同时，还可以吸收借鉴国外好的做法、经验，包括合理成熟的国际规则和惯例，先进的科技成果和优秀人才，有利于形成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创新重塑新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实现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是关键一招。今天的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创新的核心是科技创新，但同时也包括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和社会创新等等，

形成全社会创新的氛围。当然，创新的外部环境要由改革推动，包括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财税政策等，特别是要设计一套好的激励机制，激发劳动者的经验、知识、创意，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创新不能闭门造车，要开放搞创新，吸收世界上的一切优秀有益成果，把中国打造成为一片创新热土。实际上，改革开放本身就具有创新的含义，创新也能够反作用于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加有利的经济社会条件，实现稳定的改革和开放。

曾培炎解读经济发展新常态六大表征

在“2014－2015 中国经济年会”开幕式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发表演讲，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解读，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将呈现六大表征。

曾培炎指出，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概念。经济发展规律表明，一国经济增长结构的转换与人均 GDP 水平存在很强的相关性。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接近 6800 美元，已经是典型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分水岭”。在这个时期我们需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人均 GDP 一万美元的中上等收入国家迈进，到 2020 年实现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为下一阶段打下好的基础。

曾培炎分析，在“新常态”这个迈向中上等收入的历史阶段，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投资驱动”逐步转换到“创新驱动”。一方面改造“老路”，摒弃以往过度依赖于消耗资源能源等物质投入、不惜环境的高强度投入的增长模式。另一方面开启“新路”，更多依靠人力资本集约投入、科技创新拉动，真正告别需求型增长过程中求数量扩张的发展阶段，迈向质量提升型的发展新阶段。

曾培炎认为，经济发展“新常态”期间可能具体呈现六个表征。首先，经济增长减速换挡。中国经济正在从增长奇迹向中高速发展回归，支撑高增长的内外部条件都在发生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

下降，经济增速换挡是大势所趋。未来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在符合环境、社会承载力的前提下，以更合理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更强的韧性，提升 GDP 含金量，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

其次，产业链向高端迈进。实践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三产比重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普遍规律。未来中国二三次产业比例将逐步得到优化，制造业技术水平提升，现代服务业长足发展，多元市场主体不断增加高质量、高水平资本品和消费品供给，创造出更多的经济附加价值。

第三，二元经济结构明显改善。过去几十年来，区域城乡“二元特征”突出，“剪刀差”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关系，称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大幅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将按照“均衡发展”理念，推进“东中西”良性互动、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农村各项改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的局面，破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

第四，从“商品输出”扩大到“资本输出”。多年来，中国对外经济不平衡集中表现在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这种模式不可能长期持续。未来资源品、消费品和先进设备技术进口会进一步增加，经常项下国际收支有效改善。从对外直接投资数字看，今年中国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资本大规模走出去，扩展其全球配置范围，将意味着中国已经有能力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培育和发展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第五，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稳定内需主体。一个大经济体必然有

一个稳定的内需市场。随着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不断壮大。2020 年，这个数字估计将达到 6 亿左右，总消费为 2010 年的三倍以上。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整体提高，以及“公平竞争、消费者选择自由、商品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中国将成为全球成熟的市场，民众购买力和需求增长将更趋稳定。

第六，中小企业和新业态或成增长新亮点。近年来，电子商务、互联网技术、金融创新、物流新业态等不断涌现，传统市场竞争格局、经营模式出现重大变化。因其具有市场准入门槛低，交易成本低，方便业主、方便用户等优势，会有力推动中小企业新一轮的“创业潮”。在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的同时，有望成为活跃市场的主体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2014 年是转折之年

2014 年 12 月 21 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傅莹出席中心主办的“2014—2015 中国经济年会”时谈到，2014 年可以认为是一个“转折之年”，现存世界秩序在应对新问题和新现象上明显吃力，今日世界对国际体系和秩序改革的需求和推动力都增强了。这可能预示着后冷战时期将走向终结，需要开启新的构建时期。中国是现存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是改革者，尤其在世界经济和金融领域秩序的建设和改革上，我们与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一定共识。但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世界主要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矛盾和分歧。中国如何主动参与，如何在秩序构建上提出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和可行的中国方案，将是我国智库需要下功夫的方向。

傅莹说，2014 年中国的国际作为也不同凡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自身的表现都具有转折性意义。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2014 年中国的国际作为可以用“积极主动”来形容，依托自身优势提出一系列地区和国际合作的倡议和主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16+1 的合作也加快步伐。当中国的经济体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的时候，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必然相应增长。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的能量，是国际上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智库可以研究和建言的重要内容。为此，也需要决策机构与智库之间进行更加有效的沟通。

她还谈到，智库在中国的政策传播等方面需要承担更大责任，

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我国的国情、制度和政策，以适应未来中国更多参与地区和世界事务的需要。因此中国智库需要提高自身思想与研究的水平，增强讲中国故事的能力。

中国经济年会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2014—2015 中国经济年会”于 21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以“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学习和解读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出席会议并致辞。



曾培炎在致辞中指出，“新常态”是一个含义丰富的重要表述，是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刻把握。这个时期我们需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中上等收入的台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常态”的突出表征为：经济增长减速换档，经济发展方式转向质量与效率型，产业链向高端迈进，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稳定内需主体，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中小企业和新业态成为经济增长新亮点。

曾培炎强调，在“新常态”下必须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三项关键任务，发挥好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改革激发新活力，开放释放新推力，创新重塑新动力。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支撑，是实现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目标的必然途径。

在主题演讲中，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认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各方面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全面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引领新常态。在具体工作中要做到三个调适：一是调适理念，要以平常心来对待增速换档的客观事实，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档焦虑；二是调适政策，在保持政策定力的同时，要强化政策创新，建立健全政策的统筹协调机制；三是调适方法，更多地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探索分析评价经济现象的方法，健全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创新完善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用新视角分析和把脉经济，用新思路抓好调控。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提出，未来要坚持一个中心和八个更加注重的工作思路，以引领新常态。一个中心是指，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八个更加注重是指，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的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和市场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的才能，更加注重提升人力资本的素质，更加

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在午餐会演讲中，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指出，2014年是“转折之年”，现存世界秩序在应对新问题和新现象上明显吃力，今日世界对国际体系和秩序改革的需求和推动力都增强了，这可能预示着后冷战时期将走向终结，需要开启新的构建时期。中国是现存秩序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是改革者。2014年中国的国际作为不同凡响，可以用“积极主动”来形容，中国依托自身优势提出了一系列地区和国际合作的倡议和主张，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和中国自身的表现都具有转折性意义。当中国的经济体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的时候，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必然相应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指出，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建设法制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主要内容。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方面，要多部门、多层级协同努力。未来行政审批体制改革方面应做出更大努力，包括：及时建立和修订审批标准，建立科学、公正、透明的审批体系；对于一些短期内无法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的建设；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依法加强政府对内部权利的制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防止权力滥用，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制，提高政府运行效率。

与会嘉宾还指出，改革开放是我国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只有不断推进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才能在“新常态”下激发中国经济新的活力和动力，增加耐力和定力。创新是经济发

展的第一推动力，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把中国打造成一片创新热土。

与会嘉宾对编制“十三五”规划献计献策。一致认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的五年，是全面落实深化改革、依法治国重大部署的五年，也是应对解决各种复杂矛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年。需要我们主动把握机遇，实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再融入”，中国经济素质的“再跨越”。

政府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近300人参加了会议。

中美投资和贸易谈判（BITT）研究成果发布

2014年10月29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召开的第65期“经济每月谈”上，发布中美投资和贸易谈判（BITT，Bilateral Investment and Trade Treaty）的研究成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今年7月份的第六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简称“二轨对话”）上，提出了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BITT倡议，得到中美双方代表的积极响应。本次“经济每月谈”发布了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完成的《推进中美BITT谈判，迈向更深层次的中美经贸合作》研究报告，就推进中美BITT谈判的基础、重大意义，中美BITT主要内容，启动中美BITT谈判的若干建议等做了阐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张晓强发布了该报告，会议由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主持。清华大学教授周世俭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对报告做了点评。

报告指出，中美 BIT 谈判已进入快车道，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中美两国都在寻求经济再平衡，两国经济长期存在互补性，中国与欧盟也启动了 BIT 谈判。这些都为中美 BITT 谈判提供了基础和铺垫。在已经谈判的中美 BIT 基础上，除了投资以外，增加一个贸易的协定，推进中美 BITT 谈判，时机成熟，意义重大。通过推进中美 BITT 谈判，建立制度化的经贸关系，有利于发挥中美两个大国的引领作用，深化两国互信，成为亚太区域一体化的桥梁，推动世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全球经济繁荣稳定提供强大动力。

中美 BITT 将涉及关税、投资、农业贸易、服务贸易、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竞争环境等关键领域，在技术创新、网络安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生态环境等领域切实推动中美合作，是一个基于中美发展实际、面向未来的高水平协定。从中美经贸路线图来看，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中美双方尽快完成 BIT 谈判；第二步，在 BIT 的基础上，加入贸易-Trade 的谈判，争取尽快启动 BITT 谈判；第三步，在 BITT 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中美 FTA 谈判。最终推动在亚太实现区域一体化，建立 FTAAP。建议把开启中美 BITT 谈判纳入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议题，两国政府设立专门部门负责此项工作，支持两国智库合作开展中美 BITT 方案研究，在 2015 年“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发起倡议。希望两国政府在 2014 年 11 月的 APEC 会议上寻求共识，推动 RCEP 和 TPP 融合或者链接，就中国加入 TPP

及美国加入 RCEP 展开讨论。

周世俭认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发布的中美 BITT 谈判研究成果，很有启发性，视野很宽广。中美 BITT 将是中美经贸发展关系上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对于推动将来建立中美自由贸易区有很重要的作用。赵忠秀指出，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果。曾培炎理事长提出的 BITT 建议，非常有智慧、务实和有建设性。在当今全球范围内各种各样的区域经济协定谈判中，中美 BITT 谈判将举足轻重，既对多边体制的演进有贡献，同时又是对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要求的呼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成果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接下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中美之间最终达成 BITT，推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的稳定发展，使得压舱石更具分量，将发挥重大作用。

该次会议还展示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分别是《中美 FTA 可行性研究报告》、《TPP 和中美 FTA 问题研究》、《关于 TPP 问题研究》和《促进中美基础设施及双边投资研究》。

第二届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在京召开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主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作为学术合作单位的第二届全球治理高层政策论坛于 10 月 22 日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围绕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体系

中的角色和面临的挑战、可持续融资、发展中国家的角色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对全球经济治理新途径、新理念进行了深入交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出席开幕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通过视频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中国等十几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约100位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张晓强指出，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但是，全球发展依然很不平衡，南北差距拉大，地缘政治动荡频发，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机构合作，形成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以促进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均衡发展。

张晓强认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是关键。为此，在制度安排与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诉求。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各国需求同存异、管控分歧，建设性地开展工作，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海伦·克拉克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在改善全球治理方面，发展中国家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越来越显著。中国除了在全球贸易、投资和发展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外，在参与全球市场和多边贸易体系以及解决自身发展和就业等问题上，为正在寻求转型的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经验。同时，中国正在利用其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来呼吁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使得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问题上赢得了更多主动权。

中韩经济合作论坛在京召开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韩国贸易协会、朝鲜日报社联合主办，商务部投资促进局、韩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韩国中小企业协会共同支持的中韩经济合作论坛，于2014年10月24日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欧亚合作新构想，中韩合作新契机”，旨在落实中韩两国领导人关于“一带一路”和“欧亚倡议”两大战略构想，进一步推动欧亚及中韩两国经济合作与发展。来自中韩两国工商界、学界人士3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韩国总统朴槿惠给论坛发来视频祝贺致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发表主旨演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在开幕式上致辞。韩国驻华大使权宁世、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副部长李官燮、韩国贸易协会常务副会长安玹镐等出席论坛并致辞。

朴槿惠总统在祝贺致辞里表示，韩中两国以互补性为合作基础，在政治、文化领域都取得了飞跃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额去年达到了2563亿美元。自去年5月份在北京召开的韩中自贸区（FTA）第一次谈判以来，韩中两国的正式合作迈入新时代，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紧密。她希望本次论坛成为新契机，通过深层讨论和积极交流，推动韩中两国经济合作迈上新台阶。

郑新立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能力，中国通过重振丝绸之路，与周边国家和沿线国家扩大经济合作，使各国能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不断增加的对外投资来加快经济发展，为亚洲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韩国作为中国的近邻，中国“一带一

路”建设将为中韩经济合作带来更多机遇。中国 21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将为韩国扩大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提供可利用的条件。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将带动中韩贸易额不断增长，中韩经济关系必将更加密切，赢得新的发展空间。

魏建国指出，中韩之间的经贸合作与其他国家相比取得了显著发展，中国对韩国的投资也有很大提升。此次论坛上，双方企业家、学者和部门领导汇聚一堂，研究把“欧亚倡议”的构想跟“一带一路”如何结合起来，实现两国优势互补，更好地发挥两国企业家的优势，它将成为亚洲、欧洲及全球经济发展一个新的重大推动力量。

论坛上，中韩两国专家、学者就欧亚合作新构想，抓住合作新契机发展中韩两国经济合作发表了真知灼见。

第二届东亚环境治理与产业合作论坛在京召开

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日本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韩国贸易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东亚环境治理与产业合作论坛 11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韩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参事官李镐俊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郑新立指出，环境治理可以成为一个产业，可以成为吸引投资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通过发展环保产业化支持环境改善和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实现。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利用已成熟的环境治理技术，从而比发达国家缩短治理污

染的时间。

木寺昌人指出，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共享东亚自然环境，在环境治理方面有着长期紧密的合作。东亚环境问题是中日韩三国共同的话题，希望三国之间继续保持和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

李镐俊认为，通过大力发展环保技术和产业，可以提高收入和就业率，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中日韩三国通过环保技术的共同开发和合作，以环保产业为基础，不仅可以解决三国面临的环境问题，也可以共同成为世界上的环保大国。

论坛上，中日韩三国环保官员、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围绕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三大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国经中心举办第 64 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4 年 10 月 22 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办第六十四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主题为：“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国经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主持了本次活动。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贺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国经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分别发表演讲。

贺铿指出，稳增长必须首先稳心态，当前经济总体上是稳定的。要继续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政府应该稳住心态采取有效措施，

首先是去库存，把很多剩余的房子慢慢能让人买得起，而不是盲目地再进行开发、盲目救市，房价收入比是房价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加快农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卢中原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化、信息现代化如能协调推进，将创造旺盛的需求，但从供给面看，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趋势性下滑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少关注速度，多关注转型。宋立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仍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重要的是要调结构和练好内功，要坚持从需求方面施策，从供给方面发力，促进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张永军提出当前各国经济普遍不如预期，各国通胀压力总体减轻，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也影响到了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郑新立副理事长总结发言提出，当前应通过推广公私合作模式（PPP）释放增长潜力，放宽金融准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聚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释放城乡一体化潜力三个方面实现稳增长。

演讲结束之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国经中心举办第 66 期“经济每月谈”活动

2014 年 12 月 29 日上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共同举办第六十六期“经济每月谈”活动，主题为：“引导可持续消费，促进绿色发展”。国经中心魏建国副理事长主持了本次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高科技司副司长孙伟、商

务部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司副司长李朝胜、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徐庆华、世界自然基金会执行总监李琳分别发表演讲。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项目副经理蒋南青参与了讨论。

孙伟表示，信息消费已经成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动力和新亮点，将成为在新常态下引导可持续消费、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很大程度上转变了传统发展方式。李朝胜指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未来将在信息消费、住房消费、旅游休闲消费、体育文化消费、养老健康家政消费六大领域，进一步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徐庆华认为，应将可持续消费纳入国家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框架，建立绿色发展促进协调机制，推动可持续消费的制度创新，建立包括国际机构、地方政府、民营机构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可持续消费实践的合作机制。李琳建议，要提高公众可持续消费意识，发挥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作用；通过绿色认证体系和资源效率统一指标等手段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教育和建立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农村产业结构来引导农村消费行为。赵萍认为，应从消费最终端的需求角度形成一个市场牵引机制，让消费者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产品，从而刺激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蒋南青认为，应对公众加强可持续消费宣传教育，在生活、厨卫垃圾扔到垃圾桶之前自觉进行分类处理。

演讲结束之后，专家们回答了媒体和听众提出的问题。国经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会员单位、企业、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的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权威言论]

在2014－2015中国经济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曾培炎

（2014年12月21日）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各项改革稳步推进，结构调整提速，转型升级加快，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在7.3%到7.4%左右，成绩难能可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的经济工作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狠抓改革攻坚和创新驱动，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本次年会以“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学习和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探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规律和特征，为做好明年乃至“十三五”的经济工作献计献策、贡献智慧，很有意义。下面，我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和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谈几点看法。

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可以概括为四个特点。一是经济增长下台阶。半年多来，国际油价从100多美元一路下跌至60美元以下，跌幅超过40%。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周期，反映出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2008年之前的繁荣景象短期内难以重现。二是各国经济政策出现分化。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美元持续走强；而日本和欧洲央行则接棒量宽；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下行，资本大量外流，政策选择面临两难。三是全球性经济结构调整。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进展缓慢，WTO 多边贸易谈判和 IMF 改革遇到阻力，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新趋势。各国普遍加快结构改革，重组产业价值链，以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四是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全要素结构悄然变化，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而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大数据、3D 打印、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都在孕育新的技术突破，有望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之变与世界之变同步。前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了深刻的阐述，是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正确把握。当前，全国上下正在学习贯彻。我理解，从时间维度上看，“新常态”指的不是短期的一、两年，也不是长期的二、三十年，而是一个中期概念。经济发展规律表明，一国经济增长结构的转换与人均 GDP 水平存在很强的相关性。2013 年，中国人均 GDP 接近 6800 美元，已经是典型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分水岭”。在这个时期我们需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人均 GDP 一万美元的中上等收入国家迈进，到 2020 年实现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为下一阶段打下好的基础。

在“新常态”这个迈向中上等收入的历史阶段，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传统的“投资驱动”逐步转换到“创新驱动”。一方面改造“老路”，摒弃以往过度依赖于消耗资源能源等物质投入、不惜环境的高强度投入的增长模式。另一方面开启“新路”，更多依靠人力资本集约投入、科技创新拉动，真正告别需求型增长

过程中求数量扩张的发展阶段，迈向质量提升型的发展新阶段。

我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期间，可能具体呈现以下六个表征。

首先，经济增长减速换挡。中国经济正在从增长奇迹向中高速发展回归，支撑高增长的内外部条件都在发生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经济增速换挡是大势所趋。未来要摆脱“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在符合环境、社会承载力的前提下，以更合理的速度、更高的效率，更强的韧性，提升 GDP 含金量，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可持续发展。

其次，产业链向高端迈进。实践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三产比重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普遍规律。未来中国二三次产业比例将逐步得到优化，制造业技术水平提升，现代服务业长足发展，多元市场主体不断增加高质量、高水平资本品和消费品供给，创造出更多的经济附加价值。

第三，二元经济结构明显改善。过去几十年来，区域城乡“二元特征”突出，“剪刀差”扭曲了国民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关系，称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大幅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将按照“均衡发展”理念，推进“东中西”良性互动、跨区域产业梯度转移。深化农村各项改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的局面，破解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

第四，从“商品输出”扩大到“资本输出”。多年来，中国对外经济不平衡集中表现在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这种模式不可能长期持续。未来资源品、消费品和先进设备技术进口会进一步增加，经

常项下国际收支有效改善。从对外直接投资数字看，今年中国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资本大规模走出去，扩展其全球配置范围，将意味着中国已经有能力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构，培育和发展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第五，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稳定内需主体。一个大经济体必然有一个稳定的内需市场。随着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将不断壮大。2020 年，这个数字估计将达到 6 亿左右，总消费为 2010 年的三倍以上。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整体提高，以及“公平竞争、消费者选择自由、商品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中国将成为全球成熟的市场，民众购买力和需求增长将更趋稳定。

第六，中小企业和新业态或成增长新亮点。近年来，电子商务、互联网技术、金融创新、物流新业态等不断涌现，传统市场竞争格局、经营模式出现重大变化。因其具有市场准入门槛低，交易成本低，方便业主、方便用户等优势，会有力推动中小企业新一轮的“创业潮”。在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的同时，有望成为活跃市场的主体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但是，不能否认，“新常态”阶段也是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的阶段，不少国家因为没有处理好而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在“新常态”下做好未来经济工作，必须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三项关键任务，发挥好中国经济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未来应该继续用好这个法宝。同时，根据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要求，还应与时

俱进地把创新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改革为开放和创新营造体制条件，开放为改革和创新拓展经验借鉴，创新则能够为改革和开放提供实践基础。三者相互关联，互为支撑，是实现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目标的必然途径。

第一，改革激发新活力。改革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断调整、适应的过程。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得到有效发挥。但是改革的任务还远未结束，在很多领域和方面，还存在阻碍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解决这些瓶颈和制约是改革攻坚期的重要任务。“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使各类经济主体和要素更充分地发挥积极性。政府职能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致力于建造公平透明的法治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革能够为创新营造更好的体制条件、政策环境，激发创新活力。也只有不断改革、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才能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力争在2020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二，开放释放新推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现在，我国外贸总量已经很大，去年成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外贸依存度开始回落，需要对未来的对外经济发展提出新的对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客观上要求我们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推动建立多双边贸易投资制度安排，扩大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维护我在国际上的正当权益。此外，世界经济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也需要我们主动把握机遇，实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再融入”。新一轮的开放，将有力推动扩大我国

在世界经济中的发展空间，推动产业链和国际分工向高端迈进。同时，还可以吸收借鉴国外好的做法、经验，包括合理成熟的国际规则和惯例，先进的科技成果和优秀人才，有利于形成外部压力和“倒逼机制”，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和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第三，创新重塑新动力。发展经济学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实现经济转型，创新发展是关键一招。今天的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创新的核心是科技创新，但同时也包括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和社会创新等等，形成全社会创新的氛围。当然，创新的外部环境要由改革推动，包括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财税政策等，特别是要设计一套好的激励机制，激发劳动者的经验、知识、创意，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时，创新不能闭门造车，要开放搞创新，吸收世界上的一切优秀有益成果，把中国打造成为一片创新热土。实际上，改革开放本身就具有创新的含义，创新也能够反作用于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创造更加有利的经济社会条件，实现稳定的改革和开放。

推进中美 BITT 谈判迈向更深层次的中美经贸合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张晓强

（2014 年 10 月 29 日）

启动中美双边投资和贸易协定（BITT）的倡议，是由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今年 7 月第六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中首次正式提出的，并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赞同。目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已进入快车道，在此基础上，除了投资以外，增加一个贸易的协定，推进中美 BITT 谈判，时机成熟，意义重大。

一、推进中美 BITT 谈判的基础

从中美经贸合作程度、两国发展需求、及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看，中美双方推进 BITT 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中美 BIT 驶入快车道。中美 BIT 谈判共进行了 14 轮，目前已经进入文本谈判阶段。这是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进展，意义重大。但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中，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等分歧，中美双方如能达成一项高标准的 BIT，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双边层面，也具有区域和全球性意义。

（二）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成立一年多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在投资便利化方面深入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形成了更加开放透明的投资管理制度。这一系列制度创新提高了政府效率、激发了市场活力。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展及将来在全国推广，为中美 BITT 实施做好了铺垫。

（三）中美都在寻求经济再平衡。美国经济的特点是国内消费拉动增长型，低储蓄，过度信用消费，高贸易赤字。中国经济的特点则是家庭消费低，高储蓄与投资，贸易顺差。金融危机后，美国和中国都在积极采取措施，谋求经济发展再平衡。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来促进资源在中美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是促进中美经贸平衡的根本途径。

（四）中美两国长期存在互补性。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方面有很强互补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两国储蓄和投资对对方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两国加强合作促进储蓄和投资更有效配置的空间依然很大。

（五）中欧 BIT 谈判进展迅速。以高水平的经贸协定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将成为中国面向世界，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方式。中欧经贸关系与中美经贸关系有很大的相似性。目前中欧 BIT 谈判快速推进，涉及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涉及到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投资。这些谈判将为中美 BITT 谈判提供更多借鉴和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启动中美 BITT 谈判的重大意义

以启动中美 BITT 谈判为突破口，继续推动中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意义重大。

（一）发挥中美两个大国的引领作用。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并有重要的国际影响。通过深化合作，建立中美 BITT，形成深度融合的制度化经贸关系，进而在 BITT 基础上，形成中美 FTA，有利于在全世界提供正向示范和引导。

（二）深化中美两国互信。BITT 谈判将形成若干制度性、长效性的机制安排，可以增加中美经贸合作可预期性和透明性，把两国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决策变为实施方案和行动，建立两国深度交往的共同规则、表达利益诉求的共同平台，形成发挥新型大国关系的共同纽带。

（三）奠定亚太经贸一体化基础。在目前全球区域一体化中，存在着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代表的“美国路线图”，东盟主导“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代表的“亚洲路线图”两条亚太区域一体化发展路径。如果在几年内中美之间形成 BITT 的构架，必将会加强“美国路线图”和“亚洲路线图”的战略互动，成为推动 TPP 和 RCEP 融合为一的桥梁，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打下良好基础。

（四）推动世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基础性战略关系。从全球看，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必须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发展实际。高水准的中美 BITT 最终目标是通过 5—10 年时间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更加广泛的超 WTO 安排，将为世界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为全球经济繁荣稳定提供强大动力。BITT 将使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动力核和发展中国家动力核产生共振效应，对全球贸易健康发展发挥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三、建议中美 BITT 谈判的主要内容

从涵盖范围看，BITT 将涵盖中美经贸中的主要关键领域。从规则看，BITT 应是一个基于中美发展实际，面向未来的高水平协定。

（一）主要内容。1、关税。重点是货物贸易减免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在 BITT 下，中美双方关税总水平近期可以各自降低到原来的二分之一，中期可以降低到原来的四分之一，长期向零关税迈进。

2、投资。中美 BIT 谈判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应逐步、及时、有效地缩短负面清单。国家安全审查不应作为隐性限制或阻碍合法投资。同时，建立畅通的双方投资沟通渠道和会商机制。中美基础设施双向投资、清洁能源和生态环境领域的投资合作可以作为重要切入点。

3、农业贸易。重点是补贴、关税减让和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双方可成立一个委员会，确保中美农业合作的长期供需关系。例如，在成本加利润的基础上，买卖双方预先确定交易价格，采用长期商品供应合同，例如 20 年。

4、服务贸易。扩大服务贸易是深化中美经济关系的重要领域，对两国都有益。双方应共同努力大幅削减服务贸易壁垒。

5、政府采购。政府采购占了世界经济总额的近 15%，约 10 万亿美元。中美两国的政府采购将各超过 1 万亿美元。中美政府采购合作将以世界贸易组织多边政府采购协定（GPA）为标杆，同时考虑中美两国经济和政府体制差异。要明确双方政府采购参与实体。可以考虑“负面清单”方式，规定所有政府实体将被覆盖，除非他们被明确排除在外。

6、知识产权。推进两国在专利领域的对接，实现双方专利信息互通、互认和共享，建立中美技术交易市场。避免滥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垄断价格。简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程序。加强信息交流和人

员往来，加深对彼此知识产权执行和行政管理体制的相互了解。加强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提高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7、重点合作领域。在技术创新、网络安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生态环境领域等方面重点开展合作。促进科技人员交流的便利化，加强基础科学合作，共建高水平实验室、研究平台和创新基地。推进双方在核能、清洁煤、页岩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及节能、环境污染治理等领域的合作。

8、竞争环境。双方都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考虑采用“竞争中立”框架，政府商业活动不得因其公共部门所有权地位而享受私营部门竞争者所不能享有的竞争优势。在投资管理上都要一视同仁，同等对待，确保双方企业能够很好地进入对方市场。美国应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二）路径。1、分三步走建立中美 FTA。第一步，中美双方尽快达成 BIT 谈判；第二步，在 BIT 的基础上，加入 T 的谈判，争取尽快启动 BITT 谈判；第三步，在 BITT 的基础上，全面启动中美 FTA 谈判。最终推动在亚太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协定（FTAAP）。这是一条切合实际的路线。因为无论何种路线，最终都要涉及到中美之间的谈判。

2、中美双方互相推动加入 RCEP 和 TPP。在中美推进 BITT 的同时，中美双方应探讨中国加入 TPP、美国加入 RCEP 的路径，避免对双边关系的侵蚀。中国加入了 TPP，美国加入了 RCEP，中美 BITT 和随后的中美 FTA 就成为了沟通 TPP 和 RCEP 的桥梁，实质上 TPP 和 RCEP 就融为一体，为最终形成 FTAAP 奠定基础。

四、启动中美 BITT 谈判的若干建议

BITT 谈判会产生巨大影响，两国应努力推动开启中美 BITT 谈判。

（一）把开启中美 BITT 谈判纳入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议题。建议两国在此前几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基础上，将中美 BITT 作为新的议题纳入，在官方层面进行相关探讨。

（二）两国政府应设立专门部门负责此项工作。中美两国应共同努力建设高水平的 BITT，对合作领域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和可行性研究，实现互利共赢，提升 BITT 质量。

（三）中美两国智库合作开展中美 BITT 方案研究。可由政府委托中美两国智库联合进行专项研究，进行前期准备，设计切实可行的方案。对中美 BITT 的成本收益进行评估，对中美双方影响评估，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影响评估等。在官方层面达成意向后，可上升到国家战略，

（四）可考虑由智库发起中美 BITT 的倡议。建议双方政府支持由“二轨”对话联合发起公开倡议。2015 年，国经中心将召开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可在该峰会发布，并组织专门论坛讨论。

（五）通过亚太经合组织（APEC）寻求共识，推动 TPP 和 RCEP 融合或者链接。两国政府在寻求新的地区贸易协定，尤其是 TPP 和 RCEP 的过程中，应避免出现竞争性或排他性区域贸易集团，同时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两国应利用 2014 年 11 月在北京举办 APEC 领导人会议的机会，推动上述目标的实现。

继续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魏礼群

行政审批是行政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政府履行职能的一种重要形式。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体制的重点任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作出了具体部署。我们必须按照中央的部署，坚定不移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这项关系全局的改革扎实推进并取得实效。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意义重大

在以往3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伴随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但这项改革远没有完成。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看，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必然要求。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目前，在很多方面市场尚不能起到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就是政府以行政审批为主要形式和手段过度干预微观经济事务、不当干预市场运行。因此，需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包括多方面任务，而转变政府职能是核心。推进行政体制

改革必须突出这个核心，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作为优先任务。目前，我国政府职能仍然存在越位、缺位、错位以及运行低效、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其中很多表现在行政审批上。大量的行政审批事项以及各种名目的管理事项，直接影响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只有继续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才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行政审批过多过滥，制约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作用的发挥，抑制地方和基层的积极性。只有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进一步给市场主体“松绑”、为社会组织“腾位”，才能更好地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防治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行政审批过多过滥，不仅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有效发挥，抑制社会投资创业积极性，增加交易成本，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是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现实中，一些部门和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审批权吃拿卡要，少数人甚至通过倒卖批文牟取私利，败坏党风政纪，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可以减少利用审批权进行寻租的机会，从源头上遏制和防治权力腐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新一届政府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作

为开门的第一件大事，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推进这项工作的突破口，持续发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数量超过预期。从去年5月至今年1月，国务院各部门分4批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416项，其中行政审批事项超过300项。按照本届政府任期内将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以上的目标，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完成任务量已经过半，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力度和进度都超出了社会预期。

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一年来，政府不仅注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数量，而且注重其“含金量”，着力推动那些涉及利益深、对有关主体和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大的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随着改革的深入，在投资项目核准、生产经营活动许可、资质资格认定等方面取消和下放了一批审批事项，啃了不少“硬骨头”。

规范行政审批取得重要进展。国务院各部门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清理和核实，摸清了“底数”。对非行政许可事项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有些纳入行政许可事项，其余的则要逐步取消。强调设立行政审批事项的法律依据和程序，推进取消于法无据的审批事项和各种名目的准行政审批事项，严格控制新设行政审批事项，防止边减边增。对于各部门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向社会公开清单，接受社会的评估和监督。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也加紧对行政审批事项和各种以“红头文件”设定的管理事项进行清理，促进了行政审批的规范化。

简政放权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带动了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

体制改革的深化，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降低了行政成本，减少了寻租和腐败空间，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表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本届中央政府不仅具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强决心，而且具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巨大勇气和能力。

不断有新作为、新突破

推进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局很好，但改革任务依然繁重而艰巨，必须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气力，不断有新作为、新突破。

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目前，国务院各部门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还有约1300项，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数量更多。仔细分析已向社会公开的审批事项清单可以看出，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还有很大空间。应继续做好政府“瘦身”、取消审批权的改革，最大限度地向市场、向社会放权，把市场能自行调节的交给市场，把社会组织能自行承担和自律管理的交给社会组织；同时，坚决把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优势、有利于提高管理服务效率和方便服务的事项下放给地方政府。不仅应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的数量，而且应注重取消和下放更多“含金量”高、对市场和社会影响大的审批事项，特别是逐步减少对投资项目的层层审批，以激发社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

严格规范行政审批。目前，行政审批不规范问题很突出，主要表现为行政审批事项的设立不规范和审批实施过程不规范。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必须公开透明和严格规

范行政审批事项的设立和实施。应推行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并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向社会公开，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还在实施的审批事项应尽快公布目录清单。在目录之外，一律不得实施行政审批。适应情况的发展变化需要新设的行政审批事项，应遵循法律程序，经过严格论证才能设立。对于一些地方和部门不符合法律规定设立的各种名目的行政管理事项，应切实加以清理和废止。为规范行政审批的实施，应对审批程序、条件和标准、时限等作出明确规定，并向社会公开。

着力优化创新行政审批。优化审批权的配置，对过于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审批事项进行整合，按照有利于提升管理效果、方便行政相对人的原则进行重新配置，解决多头审批、重复审批问题。改进审批流程，对现有审批流程进行梳理和评估，重新设计工作程序，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创新审批方式，特别是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通过网上审批等新方式提供便捷高效的审批服务。

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做到放管结合。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必须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管。审批是一次性的源头管理，监管是长期性的过程管理。减少审批、强化监管，对于各级行政机关而言，是由行使权力向承担责任转变、由实施管理向提供服务转变，要求更高、任务更重。在监管对象量大面广、监管事务环节多链条长的情况下，必须完善监管体制机制、创新监管方式和手段，切实加强监管和服务。至关重要的是，多设路标、少设路障，抓紧把规范市场运行、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规则、标准、治理体系建立起来。

把握好放权的进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方向要坚定、决心要大，但取消和下放什么事权，下放到什么程度，应综合考虑市场自行调节的外部环境、社会组织的发育成熟程度、政府的监管能力等各方面条件和能力，把握好放权的力度和节奏，提前谋划应对下放权力后的新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风险，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既能带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又能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相适应。

加快推进法治建设。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遵循法治轨道。坚持法治基本要求，依法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和行为；同时，加快清理、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进程。特别应强化执法，加快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经济、法治社会，增强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从而真正做到市场、企业、社会活中有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让社会参与改革。政府取消哪些事项、下放哪些事项、保留哪些事项，下放的事项由谁承接、保留的事项由哪些政府部门负责，需要通过适当形式组织相关群体代表和专家进行讨论和评估。改革方案的执行、审批行为的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通过相应的渠道开展监督。社会广泛参与和监督，有利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拥护，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深入，取得预期效果。

（原载 2014 年 7 月 30 日《人民日报》）

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郑新立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经历了从承包制到利改税、从厂长负责制到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过程。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进入快速推进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和国企改革发展中的新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当前，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贯彻落实《决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

《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是把国企做大做强的客观要求。实现这一转变，国有资本功能不仅不会弱化，而且会放大和强化。

按照现代产权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建立以股份制为基础的公司制，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需要，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

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为突出主业、向产业链高端迈进，必然要对经营业务及时进行调整。企业购进一些有利于产业升级的优良资产，处置一些不需要的资产，以提高资产利用率和使用效益，属于正常经营活动，应交由企业自己作出判断和决策。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所追求的目标，应是资本增值和利润率提高，对具体资产形态变化不应过多干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直接管资产，不仅不易管好，而且可能会架空企业经营自主权，降低企业市场应变能力。

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从管资产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有利于优化国有资本配置，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对于产能过剩行业，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可抽出一部分资金，投入到急需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供给不足的行业，从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宏观经济效益。

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管理模式可以有三种途径：一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一些行业性大型集团公司，可考虑赋予其国有资本投资经营权，鼓励其发展成为国际化集团公司。二是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和提高资本收益为目标，专门从事资本运营。三是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通过对各个行业的各类企业退股、参股或控股，放大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壮大国有资本。

对国有资产实行以管资本为主的制度，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在以股份制为基础的现代公司治理中，国有股在整个股权结构中占有多大比重就应拥有多少投票权。除了一些特殊行业的个别企业，如传媒企业，国有股可作为特殊管理股享有一票

否决权，一般情况下，国有股应与其他股权一样，享受平等权益。这就可以使企业真正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经营层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的科学治理结构，以适应国内外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不干预企业经营活动，让企业拥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是办好企业的前提。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决定》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决定》指出的改革方向，是国有经济发展壮大的根本方向，也是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效率的根本方向。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各类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单一所有制企业在资源条件上往往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竞争力受到影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好的资源，通过优化组合，形成新的生产力，产生明显的竞争优势。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形成多元制衡机制，有效避免企业被内部人控制，使股东获得最大投资收益。经验证明，有些企业搞不好，往往是由于企业被内部利益集团控制，不顾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一些上市企业，大量小股东不可能参与企业经营决策，而企业经营和财务又不透明，导致股东利益受损，挫伤投资者积极性，成

为股市不振的根本原因。在混合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能有效矫正企业经营行为，促使上市公司以提高企业价值为最高经营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各类所有制经济中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部分。这种伴随生产社会化出现的股权社会化、多元化经济，有利于更多居民成为投资者，增加财产性收入，体现社会进步。《决定》提出："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这是增强国有经济活力的重要举措。回顾改革历程，正是由于乡镇企业发展为国有企业提供了竞争压力和劳动力分流的条件，国企改革才得以顺利推进。当前，国有经济吸收民营经济入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国企改革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民营经济进入国有经济，必将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实现互利双赢、共同发展。

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

《决定》指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是总结国内外企业的成功经验提出来的，是对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员工持股使企业员工具有企业所有者和劳动者双重身份，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从而更加关心企业兴衰，能够大大提高企业的凝聚力。

在发达国家，一些企业之所以长盛不衰、成为百年老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实行员工持股制，包括核心层持股、骨干层持股和老员工持股三个层次。核心层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十几个人。骨干层包括二级公司经理、职能部门负责人和技术、管理骨干等，约几百人。管理层持股在任职期间和离任后 5

年之内不允许出售。再加上老员工持股，把企业员工的物质利益与企业经营绩效紧紧捆绑在一起，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不仅关心企业近期盈利，更关心企业长远发展，从而在科技研发上舍得增加投入。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一些成功企业如华为公司等，也实行员工持股。实行员工持股制，决不是人人有份，回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老路，而是要建立激励机制，奖勤罚懒。能不能持股、持多少股，要根据员工对企业的贡献，由股东会决定。要避免企业被内部人控制，就要实行财务透明制度，加强企业监管。

《决定》还要求，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国有资本作为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物质基础的体现，有利于动员全体人民支持国有经济发展。

对不同功能的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改革

由于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有企业对占有的国有资产拥有法人财产权，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根据其不同功能，实行有区别的分类改革。

对公益类国有企业，应加大国有资本投入，增强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尽快改变目前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局面。如针对养老院、幼儿园、停车场、医院、职业教育等供不应求，工业脱硫、脱硝、除尘以及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能力等严重不足，国

有资本投资公司均应加大投资力度，同时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吸引社会资金投入，以改善生态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需求。加快建立共享性公共产品市场价值补偿机制，鼓励企业为提供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作贡献。

对自然垄断行业，如铁路、电网、基础电信、管道等基础设施，应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铁路虽然具有自然垄断特点，但投资主体也可以实行多元化，吸收地方政府和民间资金投入。铁路货运和客运业务更应放开经营，形成多元竞争格局。电网体制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改革已经多年，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应按照保护环境的要求，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使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电信基础服务已有几家公司开展有限竞争，增值业务已放开经营，应进一步完善竞争体制，鼓励充分竞争。管道运输在我国仍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美国管道总长度有 50 万公里，我国仅有 5.5 万公里。应加大改革力度，促进管道运输发展。此外，为了改善大气质量，应大力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实行“X+1+X”模式，即“放开两头、管控中间”，放开气源供给，集中进行管道、储气设施建设，允许燃气生产商竞价入网；对使用天然气的成本予以适当补贴，鼓励更多用户使用天然气。

对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应取消包括贷款在内的一切优惠，使之与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

（原载 2014 年 12 月 25 日《 人民日报 》07 版）

[国际交流]

2014 年 12 月 14-19 日，曾培炎理事长率团赴台湾出席 2014 两岸企业家台北峰会。

2014 年 11 月 8-12 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赴阿联酋迪拜出席主题为“重塑世界的转型”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年度峰会（2014-2016 年期间），初步确定本届中国理事会研究报告主题为中国创造生态环境。

2014 年 12 月 5 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出席中国美国商会答谢年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2014 年 10 月 17 日，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会见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执行长斯蒂芬·科恩教授。

2014 年 9 月 2 日，郑新立副理事长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会见加拿大加中议会协会共同主席胡子修参议员和杨萧慧仪众议员，就中加关系交流看法。

2014 年 9 月 2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日本外务省审议官长岭安政，就中日韩 FTA 及日美 TPP 谈判等问题交流。

2014 年 9 月 24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在国经中心会见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诺德厚。

2014 年 9 月 25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三星公司中国区社长张元基。

2014 年 10 月 16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出席韩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

2014 年 10 月 28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会见基辛格事务所董事总

经理雷默。

2014 年 11 月 27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在国经中心会见日中产学官交流机构理事长清川佑二。

2014 年 12 月 2 日，魏建国副理事长出席新西兰驻华大使伍开文离任招待会。

2014 年 10 月 17 日，张大卫秘书长会见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执行长斯蒂芬·科恩教授。

2014 年 10 月 16 日，张大卫秘书长会见三星中国公司张元基社长。